

# 汎論司馬光資治通鑑 (五之三)

李 則 芬

## 五、先看清宋人苟安姑息的思想毒素

本文開頭所說影響「通鑑」的諸因素之四，是宋人的苟安、怕戰、姑息思想。這些毒素淵源於五代，因為宋是篡位得國，開國之初，朝中大臣皆五代舊人，所以一開始就繼承了五代的遺產。作者在拙著戰爭史上，曾指出宋人繼承了五代遺產三種，一是民族精神喪失，二是因循苟安，三是北人排南。北人排南的五代遺風，是宋代黨爭的淵源，此處姑不論。其他二事，宋人加以「發揚光大」，不但宋代深受其禍，至於隕滅，且藉著司馬光「通鑑」的傳播，禍延後代，遂使中國積弱千年，萎靡不振，迭受異族侵凌，甚至被西人譏為「東亞病夫」。現在先論民族精神的喪失。

五代之喪失民族精神，或敵愾同仇的鬥志，應溯源於唐代的長期戰爭。作者有時跳出文學領域，來思考中國古代的民俗與文風。總覺得古代中國文學，在唐以前，反映著粗獷豪邁的社會風氣，故多壯烈之詞（自然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）。憂傷抑鬱與非戰的文風，則隨著唐代安史之亂始興起。唐以前，雖亦代有長期戰亂，偶而也產生悲觀亂離與哀傷頹毀的作品，如蔡琰的「悲

憤詩」，與王粲的「七哀詩」等，然一般社會風氣與文學大勢，還不失豪情俠氣，或丈夫氣概。降至東晉、南北朝，儘管天下大亂，國破家亡，流離失所，猶有祖逖「擊楫渡江」，宗愨「乘長風破萬里浪」的豪氣，足以媲美漢班超的「投筆從戎」，馬援的「馬革裹屍」，及霍去病的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」等豪情壯志。在文獻方面，隋代猶有斐矩撰「西域圖記」三卷，並上表建議混一戎夏。在文學方面，儘管一般人趨向唯美主義，仍有「木蘭詩」傑作。自唐代安史之亂起，士氣文風始大變，中唐以後的名詩人作品，大都淒涼哀怨，甚或萎靡頹毀，尤充溢著非戰意味，也就不復見慷慨悲歌了。杜甫的「兵車行」、「新安吏」、「潼關吏」、「石壕吏」、「垂老行」、「北征」、「新婚別」、「無家別」……等詩，與李華的「弔古戰場」文，是此一風氣轉變的開路先鋒。從此便形成一種新文學風格，盛唐、晚唐詩人皆紛紛仿效杜詩，刻意描寫社會的黑暗面，特別是戰爭的殘酷與罪惡。如「農者罷耕耘」，「士卒難全形」，「可憐閨裏月，長照漢家營」，「古來征戰幾人回」，「萬里無人收白骨」，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「梅教夫婿覓封侯」，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深閨夢裏人」，

「三春白雪歸青塚」……不勝枚舉。白居易的「新豐折臂翁」，甚至為自毀肢體以逃避兵役的人謳歌。於是，「敵愾同仇」、「義無反顧」、「視死如歸」、「不共戴天」、「滅此朝食」的大丈夫氣概完全喪失，也就是喪失了民族精神或鬥志。五代承唐宋一百五十年大亂之餘，又當十戈擾攘，迄無寧日的時候，自然很容易受到上代灰色文風的影響。

然此一影響，還不是最有力的直接原因，只算是助燃的氧氣，不是點火的燧石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五代文官的無耻。五代換朝不換官，每一新朝，皆將前朝百官留任。馮道且歷事四朝，三入中書，在相位二十餘年。甚至契丹主滅晉，入大梁，晉朝的百官，也照樣的全班人馬上殿伺候，不以為耻，時論且稱譽馮道應付得好，保全了人民。其原因是，五代之中，後唐、後晉、後漢三代，皆為異族統治，百官伺候異族主子數十年，奴顏婢膝已久，所謂「嚴夷夏之防」的民族堤防，業已完全崩潰。

宋人繼承了這一個遺產，也就忘掉了民族精神，喪盡了鬥志。以當時的事實而論，他們事事唯恐邊陲生變，自我毀「盟」，每戒疆吏，敵「非舉國入寇，毋得應之。」（宋史安燾傳）。對

於歷史上的前代對外用兵，則不論青紅皂白一律視之爲黷武——說得委婉一點的，則斥之爲好大喜功，動兵於外。而最能表現宋人喪失鬥志，沒有民族意識的事，則莫過於對於幽薊十六州（亦稱十六州）的漢視。

考幽薊十六州爲契丹所據，中國失去了北方天然形勢，是趙宋的致命傷。宋人不得不在今日河北、山西二省，無險可據之處（山西較好），配置三四十萬兵，駐戍百餘年。稍後又加上防堵夏人侵擾，在西北置兵二十萬，也是百年久成。這五六十大軍，拖垮了宋國的財政，苦壞了轉輸的人民。這還不算，久戍之兵，將驕卒惰，且差役繁多，訓練怠忽，紀律廢弛，兵器窳劣而又缺乏。（可參看宋史兵志及歐陽文忠集卷一一五——西）河北時的奏劄——歐陽文忠集卷一一五——西）加之宋朝祖傳風氣，深忌將才，以文人治軍，遂使五六十萬戍軍徒有其名，毫無戰鬥力。所以遼兵一舉而長驅直入，迫宋人訂下澶州的城下之盟；金人一舉而直搗汴京，擄去徽、欽二帝，北宋以亡。

由此可見，十六州的得失何等重要，爲宋代國家民族安危之所繫。然宋初出師北伐，欲收復幽薊時，大臣竟紛紛反對，下面當以趙普的手奏爲代表，再行細述。還有宋人薛居正的「五代史」，歐陽修的「新五代史」，及司馬光的「資治通鑑」，對於後晉主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與契丹一事，皆無一語評論，簡直是等閒視之，好像無關痛癢似的。我們只要想一想，東晉及南朝諸國，國勢那麼衰弱，還念念不忘規復失地，屢次與師

北伐；兩相比較之下，便不難體會到，宋人喪失民族精神的可哀。

五代的苟安思想，起因於文官的可憐地位。五代戰爭頻仍，唯武力是視，文官毫無地位，只可領到「不堪作軍資」的物品爲俸錄，有意見皆不敢上陳。積之日久，就養成一種得過且過的苟安心理。後唐宰相馬胤孫（亦作裔孫）有三不開的綽號，不開口議論，不開印行事，不開門延士大夫。實際上，五代在朝的士大夫們，都抱著這種不問事的態度，不限於馬胤孫一人，不過各人地位有不同，苟安程度有差異而已。趙宋開國後，欲矯五代之弊，但知以文人治軍，抑制武人，而不知文人所繼承五代苟安風氣，較之跋扈武人尤爲可怕。因爲跋扈行爲顯而易見，像外表的毒瘤，只要朝廷處置不乖張，是不難割除的。苟安思想有如暗病，隱而不見發現，最難治療。何況宋人文章好，很會文過飾非，使人無法覺察出，在他們「恤民」的美麗謊言中，骨子裡却是十足的苟安思想。因此，早在宋太祖開國之初，舉朝就充滿了苟安風氣了。畢沅「續資治通鑑」宋紀八，太祖開寶九年紀稱：

三月辛未，帝至西京，見洛陽宮室壯麗，甚悅。……帝生於洛陽，樂其土風，嘗有遷都之意。始議西幸，起居郎李符陳八難曰：「京邑凋敝一也，宮闕不備二也，郊廟未修三也，百司不具四也，畿內民困五也，軍食不充六也，壁壘未設七也，千乘萬騎乘暑扈行八也。」（八難內容取李符傳補入）帝不從。既畢祀事，尙欲

留居之，群臣莫敢諫。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：「東方有汴梁之漕，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，都下兵數十萬人，咸仰給焉。陛下居此，將安取之？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，根本安置已久，不可動搖。」帝亦弗從。晉王（太宗）又從容言遷都非便，帝曰：「遷河南（洛陽爲河南府）未久，當遷長安。」王叩頭切諫，帝曰：「吾將西遷者，非它，欲據山河之險，而去冗兵，循周、漢故事，以安天下也。」王又言：「在德不在險。」帝不答。王出，帝顧左右曰：「晉王之言固善，然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殫矣。」

按遷都是百年大計，何況遼兵入汴（滅後晉），教訓猶新，而宋人徒以畏難苟安，阻撓大計，豈不可惜。事實上，洛陽在五代期間，是後唐的國都，其餘四代的西都，且自唐末張全義輯撫流亡之後，已有八十年未遭兵燹，決不是荒涼城市。何況後梁的宮廷費用，皆由洛陽供應（五代史張全義傳），而宋太祖這次到洛陽時，且已有壯麗宮室。又考隋、唐漕運系統，遭受兵禍破壞者，以汴淮之間最爲嚴重，汴京以西較少破壞，修繕並非難事。周世宗只有百州之地，人力財力有限，猶能力排衆議，修濬汴河，以通兩淮。宋太祖既已統一中國，如有周世宗的魄力，則修濬汴西漕運，輕而易舉。然太宗及群臣，由於畏難苟安，阻撓大計，遂種下金人輕易入汴，擄去二帝之禍，而北宋以亡。舉此一事，即不難理解，趙宋自開國之始，朝中就充滿著因循苟安的思想。

宋人繼承了五代文官的苟安、怕戰兩種思想，益加以「發揚光大」，所以對外事事姑息，寧願讓土地，納歲幣，委曲求全，以換取一時苟安。他們對遼對金，甚至對於割據西北一隅之地的小小夏國，皆步步退讓，不惜屈辱輸財，購買表面和平，且小心翼翼，謹防所謂「生變」，以期逃避戰爭。他們像駝鳥一樣，把頭藏起來，不敢面對現實，力圖振作。他們時常用美麗的名詞「恤民」作幌子，以掩飾其苟安怕戰的病態心理，並為其姑息政策作辯護。南宋太可憐了，不談也罷。北宋以統一中國的餘威，還算得上一個強大國家，而北宋的那些賢相名臣也者，竟隨時發出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。現在且讓我們舉出一些事實為例，使讀者先認識宋人這種病態心理，然後才能理解司馬光「通鑑」傳播這些毒素的可怕。

薛居正 太平興國四年(九九九)，太宗議伐太原(北漢)，宰相薛居正反對用兵，他說：「……得之不足以關土，舍之不足以爲慮，願陛下熟慮之！」(續通鑑)那時候，全國皆已降服，只要消滅北漢，就完成了中國的統一，只因太祖晚年進攻太原受挫，薛居正等就反對太宗出師，寧願統一大業功虧一簣。

趙普 雍熙三年(九八六)，曹彬等北伐兵敗，趙普手疏諫曰：「伏睹今春出師，將以收復幽薊……蠢茲僭竊，誠非我敵，蓋以本無禮義，復處窮荒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。自古聖王，置之度外，恣其隨逐水草，實以禽獸畜之。伏料聖明，何足介意。竊慮邪諂之輩，蒙蔽聖聽，致興不急之師，頗涉無名之舉。……竊念大發驍

雄，往殲兇醜，百餘萬衆之生聚，飛輓而供；數十州之土田，耕桑半失。故所謂以明珠彈雀，因颺鼠而發機，所失者多，所得者少。……」(摘自宋文鑑所載原文，宋史趙普傳及續通鑑的文摘，各有小異。)

按宋初收復幽薊的失敗，是由於太宗用兵御將不當，及曹彬將才拙劣，此事另當別論(可參看拙著五千年世界戰爭史第三冊九篇四章)。然如前所述，遼據幽薊十六州之地，使中國北疆形勢盡失，宋人不得不於三關無險可據之處，長期配置數十萬戍軍，這是北宋的致命傷。可見宋初北伐之舉，實爲國家民族安危之所繫，而趙普竟稱之爲「不急之師」，「無名之舉」，喻之爲「以明珠彈雀，因颺鼠而發機」，何等荒謬！趙普身爲兩朝宰相，國之元老，不但視幽薊十六州遺民如草芥，對於國防形勢的百年大計，亦無動於衷。

文彥博 英宗治平三年(一〇六六)，夏國大舉入寇。先是，夏國主元昊末年，因久戰國虛，又與遼失和，乃求和於宋。宋遂册封元昊爲夏國王，歲賜絹十萬匹，茶三萬斤(仁宗慶曆三年事)。元昊死，子諒詐立，歲賜依舊，然夏人仍不時寇邊。至是，夏兵更大舉入寇，諒詐自率十萬騎(宋人誇張，當係傾其國內可資調遣的三四萬人，悉力來犯)，圍大順城。韓琦請罷歲賜，絕其和市，遣使問罪。文彥博等曰：「如此則邊釁大矣！」宋廷納其議，歲賜如常。其實夏國之降宋，實逼於情勢，本無誠意，許降之初，給與歲賜，已十分失策；今已背叛，且以傾國之衆入寇，文彥博等連停止歲賜與遣使問罪的勇氣都沒

有，還成什麼話！後來，知延州陸鈺將歲賜截留，而諒詐終於遣使告罪，尤可見文彥博等議論不當。(宋史韓琦、陸鈺二傳及續通鑑)

富弼 熙寧元年(一〇六八)，神宗初即位，召富弼入覲，先問以治道，繼又問及邊事。富弼對曰：「陛下臨御未久，當佈德惠，願二十年口不言兵。」(宋史富弼傳)按當時的情勢，北方的契丹，佔據幽薊十六州，虎視眈眈。宋於今河北、山西二省之地，配置三四十萬兵，築城以成，將近百年。久戍之兵，將驕卒惰，士氣日益低落，除耗損國庫，拖累人民外，一無是處。真宗景德元年(一〇〇四)，契丹大舉南犯，長驅直入，逼宋人訂了城下之盟而退，宋與歲幣銀十萬兩，絹十萬匹。仁宗慶曆二年(一〇四二)，契丹聚兵幽薊，揚言南下。仁宗遣富弼爲使，許增歲幣銀十萬兩，絹十萬匹，歲賜改爲歲納，契丹始允通好如故，沒有南侵。西北的夏國，更是頻頻入寇，歲無寧日。宋於陝西五路，置兵二十萬(約四倍於夏國全國兵力)，而一籌莫展。國家財政早已不勝負荷，人民的轉輸之勞，又復百數十年如一日。在這樣的情勢之下，惟一的救藥，是練兵選將，先消滅夏國(其事並不難，詳下)，罷去西北二十萬兵，然後徐圖收復幽薊十六州，汰冗兵以舒國庫，並使華北各省人民各安生業，此外別無自強圖存之道。後來事實證明，宋人不此之圖(圖而受阻於姑息政策)，卒致夏國兵禍與北方戍軍，皆與北宋同終止。然而，當此之時，富弼竟勸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，真令人百思不解，難怪神宗聞之「默然！」

……

韓琦 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，遼遣使議疆界，賁宋人於河東路（今山西省）沿邊增築戍壘，起舖舍，侵入遼地。神宗手詔徵詢老臣意見，韓琦覆奏，請罷河北所置三十七將等事，以釋遼人之疑。（宋史韓琦傳）關於此事，「歷代通鑑輯覽」的御批批得很對：「韓琦請遣使諭意，守舊境以修前好；如彼自敗盟，則一振而復故疆，據宿憤，所論切中事理。惟請罷將官之類，以釋可疑之行，非惟迹涉張皇，且因敵國生變，自撤邊防，亦非籌邊良策。至謂植柳西山，築城河北，為邊端所由，更不免過存畏怯。琦昔在西夏，威望素著，何亦為此委靡之見耶？」

按此次交涉結果，命韓縝與遼使蕭禧議界。「宋史」神宗本紀有「河東割地」四字，韓縝傳但說依分水嶺為界，未說割地事。「歷代通鑑輯覽」載，失地七百里，作者未發現其出處，只見葉適「水心集」卷四說，割地數百里。

司馬光 神宗末年，夏人以傾國之衆，二攻蘭州不克。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，夏主秉常遣使入朝，賀哲宗即位，因求歸還蘭州，米脂等五砦。時高太后臨朝，司馬光為相。光不願群臣反對，謂「不應見小忘大，守近忘遠，惜此無用之地，使兵連不解，為國家之憂」，斷然允許歸還。未幾，司馬光死，又得安燾力爭，才算保存了蘭州，只歸還其餘四砦。（宋史夏國傳及各通鑑）

司馬光的苟安、怕戰、姑息心理，真是到了極點。當時蘭州地位十分重要，有蘭州，則歸附未久的遼、鄯（今青海境內）吐蕃，有宋援可恃，向心鞏固；無蘭州則遼鄯孤立，將被夏國脅迫

而降敵，益增夏人聲勢。事實證明，蘭州於神宗元豐四年（一〇八一）九月始克復，元豐六年（一〇八三）二月，夏國即大舉來攻；七年（一〇八四）正月，又以傾國之衆寇蘭州城。「宋史」夏國傳說，六年夏人攻勢，用兵數十萬，七年用兵八十萬，自然是胡說，然二次皆以其舉國可資調遣的三四萬兵，悉力來攻，則為不爭的事實。夏人已以蘭州為必爭之地，則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，不難想見。這麼重要的地方，司馬光竟稱之為「無用之地」，何等荒唐！且自李繼遷據宋以迄此時，七十多年來，往事歷歷可考，夏人每逢久戰疲敝，則請和以圖喘息，一俟元氣稍復，或有機可乘，即再度入寇。忽和忽戰，雖和仍復寇邊，終北宋時代，皆是如此。司馬光想藉讓步以討好夏國，換取和平，其愚誠不可及。至於司馬光所謂「不應見小忘大，守近忘遠」，更是似是而非之論。陝西二十萬兵不能罷，雖和又有何益？且勝敗兵家常事，宋雖有靈州之損失，夏人二攻蘭州不克，其損失恐怕更大。司馬光以靈州的損兵折將為理由，力主罷攻言和，無非是他的姑息心理作祟而已。

宋代姑息論者，最常用的藉口，一是「省費息民」，一是不可自我「啓釁」。這兩個似是而非的議論，後人受了「資治通鑑」的麻醉亦多應聲蟲，必須在此指出其荒謬。效以夏國的事為例，先拆穿那個美艷動人的「省費息民」西洋鏡。諸葛亮「出師表」說得好：「事不可息，則往與行勞費正等。」須知與夏和好，徒增歲賜，陝西二十萬戍兵不能罷，國庫養兵的重負，人民轉輸的

痛苦，依然如故，何能「省費息民」？那麼，宋人為什麼不選拔有為將才，訓練精銳騎兵，講求有效的攻勢戰略，消滅夏國，一勞永逸呢？

作者在戰爭史宋代篇說過：「人才代所有，如有偏枯現象，病在不讓人才出頭。」北宋並非沒有將才，最懂得西夏國情，最善用騎兵戰術的，莫過於王德用。元昊叛時，德用自請前往討伐，不但不許，且因其貌似宋太祖，有異相，且得士心，讒言謂其不可久典機要（樞密院），出為武寧軍節度使。稍後又出了一位將才狄青，他出身行伍而智勇過人，軍紀嚴肅而士卒愛戴，然亦以「得人心」而被讒出判陳州。作者相信，倘以王德用或狄青為討伐軍統帥，授以全權，朝廷不加掣肘，必可一戰而平夏國。然趙宋不知用將才，亦不敢用將才，只有採納范仲淹一味防守的戰略，以四五倍於夏國的兵力（約為其全國兵力的四倍，為其可用兵力的五倍），分佈於陝西五路，防守百年之久，耗盡國庫民力，弄得公私交困。一言以蔽之，宋人所採取范仲淹戰略思想，無非一個「拖」字，過一天，算一天，一直拖到國亡為止。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，這是最愚蠢的戰略，最可耻的戰役，而宋人還竟稱韓范安邊（至今猶為人所稱道），真是天曉得！

即使不能選拔將才，練成勁旅，也儘有很多策略，可滅夏國。夏小國也，地不過十四州，兵員不過五六萬（宋史夏國傳所載的兵力是胡說八道，須以韓琦、劉平二傳所說為是，詳情可參看拙著「成吉思汗新傳」三十四章滅西

